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农户个体决策与农民经济组织的内生性

——超边际视角下的农民经济组织

吴忠明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 广州 510053)

摘 要:单个农户在分工协作中能够获得"1+1>2"的分工经济,通过特定的经济组织来安排单个农户的分工协作就会实现这种分工经济。但是,组织中的单个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必然存在着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超过了分工协作的经济性,单个农户就不会选择加入经济组织。地方政府往往不能充分理解单个农户对经济组织中交易费用和相对价格的考虑,这导致了大多数农户不愿选择加入"模式"型的经济组织。因此,地方政府要以自身的分工特征合理融入农民经济组织发展的各个阶段。

关键词:个体决策;农民经济组织;分工;交易费用;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F325.15;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3-0015-09

一、导言:问题的提出

在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进程中,农民经济组织始终都是要被极端重视的问题。从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来看,这个问题还是令人担忧。2002年底我国共有各类农民经济组织94,000个,带动农户7265万户[1],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0%。剩余的70%的农户中还包含着6,000万左右的闲置劳动力。2004年底,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总数为1,042个,仅仅约为同期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0.7%;其中会员仅占全省农户的1%,所带动的农户也只占全省农户数的7.5%[2]。留在农业领域内的农户所选择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兼业化生产或者是原始的小商品生产。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80%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农民经济组织,8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由农村合作社提供的,80%以上的农产品也是经由合作社销售。游离于经济合作组织之外的农民已极为罕见[3]420。相比国外180多年的合作史,我国的农民经济组织显得尤为孱弱[4-5]。

我国农民经济组织大致分为两类[6]52-53,[7]3:政府推动型和农户自组型。政府推动型农民经济组织主要是由政府推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形成的,这类组织在数目上和农户参加数上一直占有很大优势。它们在短期内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农户在组织的发展初期也愿意加入;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类组织的后续发展并不具有生命力①。农户自组型农民经济组织是在诱致性制

收稿日期:2007-04-29

作者简介:吴忠明(1977—),男,湖南津市人,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① 这主要是因为:1.此种组织的类型比较单一,农户的选择余地小;2.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不尽合理,极易导致地方政府和组织中的其他经济主体与农户争利,从而挫伤农户的参与积极性;3.有可能演变为变相的官办企业和私人的附属企业(周林,2003);4.缺乏创新机制,加上农户在组织中的非主导地位更不利于他们进行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德国合作社学者缪恩克勒(Hans-H. Münkner)指出,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诸如免税、贷款或技术支持等物质激励手段来促进合作社发展,使得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略,这些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就是这些国家官方主导的合作社发展计划常常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度变迁的机制中形成的。目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并没有给人以一个乐观的前景[3]422。此两种类型并不截然相分。政府推动型组织是农民自组型组织的逻辑起点,从实践上来看,后者的出现是农户对前者在一定程度上的扬弃[7]4。并且可以预见,这个扬弃过程会随着相关法律制度[8]的颁布施行不断深入。

此外,农民经济组织理论层面上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梳理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两种并行不悖的现象:庞大数量的农民在生活居住上的集中[6]59-60和在生产经营上的非集中[9]5。按照斯密定理的逻辑[10]369-370,我国农村天然就具备了蕴育发达的市场与农村经济的必要条件。很自然地,农村经济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研究思路就因循了这种逻辑。对以科斯定理[10]178-179为核心的制度理论的关注滥觞出了另一种研究思路,制度改革与组织创新成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然而,在我国农村经济的理论研究中,这两种思路所体现出来的隔阂却要远远多于其融合。这是否与现状存在一种纯粹巧合的对应呢?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疏忽:理论研究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农村的核心微观主体——农户,农村经济研究的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没有得到沟通,这又进一步地引致了农村政策指向的不确定性,限定了政府作用力的深度和范围①。

因此,针对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现实与理论的发展状况,需要弄清楚的是:农民经济组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走进农民经济组织的"黑匣子"中,解析农民经济组织的形成机制和创新机制。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村经济的首要问题在于农户如何组织起来和农户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将农户组织起来并不断提高其组织程度是解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这同时也是国际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和总体趋势。只有把单个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使其在经济舞台上形成具有抗衡能力的集体,才能保护好农业、发展好农业和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我国也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

二、农户个体决策

农户决策包括离散性的超边际决策②和连续性的边际决策③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前者是基础,农户所作的超边际决策要先于边际决策。只是超边际决策决定农民经济组织的存在性问题和哪种组织能够存在的问题。

(一)农户决策的集合

根据我国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现状可以大致将农户的超边际决策分为两类:

1. 生产阶段上的决策

在农业生产中,农户既会选择兼业化生产、分工协作生产和企业生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会对生产何种上下游产品或最终产品做出决策。当然,农户也可以不选择进入农业[11]。

2. 非生产阶段上的决策

农户可以在销售、购买、融资、信息等一切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条件和增殖收益的环节上做出专业选择。如农户选择专门收购农产品,成立连锁店或超市,在农产品的销售环节上实现专业经济。从经济组织的角度,可以把这两类超边际决策归纳为对组织性经济活动和非组织性经济活动的选择(包含选择哪种组织形式在内)。

(二)农户决策的复杂性

① 受主题和篇幅的限定,该主题没有在下文中展开。

② 选择进行哪种经济活动的决策。

③ 对所选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的量的决策。

分工形式的复杂性导致了决策的复杂性，而决策的复杂性又会产生更多的分工形式。现代农业的发展表明：在农产品所经过的田间地头与消费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环节、联结复杂的网络体系。受市场、技术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现代农业以原始的农业生产为开端，如生物进化般地繁衍出了不断分层并且无穷发展的子产业。大多数农户已跳出农业的基本生产领域，不断地向产前和产后延伸和扩展着自身的影响力。这种农业经济网络式的发展没有尽头，每一个农户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效率特征在这个网络体系中选择自己的结点，或者为这个网络体系创造出新的结点。没有哪一个人或组织能够全部理解每个农户的决策信息和效率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实现农户的帕累托最优。有了保护农民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安排，农户在网络体系中进行的制度探索就会产生出超乎想象的结果。只有在自发形成的农民经济组织中，农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激励性和创造性。这也正是农民经济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内因。

（三）农户决策的理性

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民经济组织时总是先入为主地从“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之类的问题出发，似乎在是否加入农民经济组织的问题上农民没有自己的观点或缺乏理性。实际上，农民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表现恰好就是农民对不同的经济环境所做的理性决策。如果站在农民个体的立场上去分析他们的经济行为，就不会存在保守、无知、没有企业家精神、缺乏市场观念等这样的评价来否定农民的经济素养。农户有着自己的效用函数和成本收益函数，“他们把边际成本和收益计算到了极至”[12]，能够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有效而又迅速的反应。农户一旦发现在组织中的交易费用过高并且降低了自身的效用或收益，他们就会丧失维系组织的激励。但是，经济组织中的非农户成员是很难搜集和分析所有单个农户的决策信息以及影响农户决策的因素，而这些信息对于维系经济组织的运作是不可缺失的。

同样不能在一般性的条件下疏忽我国农民的经济素养[13]，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不应该归咎于我国农民的个体特征①。要想理解农民不愿被组织起来必须站在农民个体的角度上去分析他们的决策和选择。这种看似落后的情形正是他们理性决策和适应经济环境的表现，他们的选择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要求。关键问题在于农民是否真正地被理解了，是否被给予了合理的有利于他们自主选择和创新的制度安排[14]。

三、分析框架：分工、交易费用和协调机制

亚当·斯密指出：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分工。必须从分工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因此，对农民经济组织的分析也离不开对其分工特征的考察。同一种分工结构可以由不同的组织形式来安排，不同的分工结构也可以由相同的组织形式来安排。只要农户在一定的经济组织内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就能获得“1 + 1 > 2”的效果②。影响农户获得分工经济主要有三个因素：交易费用、分工结构、专业化经济。

（一）交易费用

① 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根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蚀掏挖下，已丧失其自有的演化规律和特征。许倬云在研究中国汉代农业（《汉代农业》，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时发现，中国早在汉代，即以精耕农作、农舍手工业和市场经济三环配套，发展了农工生产结合的市场交易网络。这一形态历一千年余虽有修改，但大致结构未变，而且有自我修补网络的机制。在西方近代工业生产及资本主义经济冲垮中国农村经济以前，中国的农业一直有其独特的形态。

② 对于这种效果，罗森称为“超加性（Superadditivity）”，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

交易费用就是在经济组织内部对分工和专业化活动进行协调和激励以维系其运行的费用。分工会内生出两个互相制约的因素:交易费用和分工经济。二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自给自足和兼业化生产的情况下农户的交易费用极少或没有交易费用,但同时获得的分工经济少或者根本没有分工经济。在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一方面,农户所获得的分工经济会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分工必然会带来农户与外界的经济联系,而交易费用的大小正好体现和衡量了这种经济联系的强弱程度[15]。当农户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农户就会有激励不断强化与外部的经济联系;反之,农户就会选择退回到自给自足和兼业化的生产状态。组织中的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是一个两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新古典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和边际分析手段,而只能从分工协作中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入手,即从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入手。选择到合适的经济组织形式就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分工经济的最大化。农户会权衡比较各类经济组织中交易费用和分工经济的差异性,采取"总成本—总收益"的方法选择使自己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组织。

(二)分工结构

分工结构是指组织成员在分工合作中的相对地位,它与组织成员所选择的专业化活动和非专业活动的差异相关。并不是所有的分工结构都会产生"1+1>2"的效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的组织成员之间。例如,假定农户甲擅长生产水稻而不擅长生产小麦,农户乙擅长生产小麦而不擅长生产水稻,在分工合作中农户甲选择生产小麦而农户乙选择生产水稻,则他们在分工组织中的总合生产力会小于他们各自进行兼业化生产时的总和生产力,也即"1+1<2"。此时由于组织中生产力水平的降低再加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农户也不会选择加入经济组织。造成这种合作组织的"失灵"并不是交易费用的大小问题,而是选择不合理的分工结构所带来的后果。如果选择合理的分工结构就能显著地提高单个农户的生产力水平,即使交易费用在一定限度内增加得很高也不会影响农户的加入。此外,如果农户不选择极端分工结构而选择一定范围内的半分工结构,那么这个分工结构就能够在实现专业化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容纳兼业化的经济活动,其总合生产力仍大于农户各自进行兼业化生产时的总和生产力①。

(三)专业化经济

专业化经济源自于单个人经济活动范围的缩小,它由单个人对自身生产函数集合的选择内生决定,通过分工可以实现专业化经济②。专业化经济有四个特点:(1)专业化经济对于选择自给自足或兼业化的生产方式的单个人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这样的生产者是以牺牲专业化经济为代价来实现消费多样性的选择,只有在经济组织中才有可能实现专业化经济。(2)专业化经济可以通过经济组织网络来实现经济利益共享,或者说具有传递性。即使组织中不是所有成员的经济活动都表现出专业化经济的特征,只要存在一个成员拥有足够强的专业化经济,也能使整个组织共

① 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活动为什么比较普遍。

② 设单个人的生产函数集合为:$\{x_i = A_i l_i^{a_i}: A_i > 0; a_i > 0; l_i \geqslant 0; \sum_1^n l_i = l; i = 1,2,\cdots,n\}$ 其中 x_i、A_i、l_i 和 a_i 表示第 i 种产品的产出、技术特征、专业化水平和专业化经济程度,l 表示劳动时间禀赋。如果生产者选择自己生产全部产品,则每种生产活动呈现报酬递减的特征($a_i < 1$);随着生产者生产范围的缩小,则他所选择的生产活动的专业化经济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有增大的趋势;当生产者仅选择第 j 种产品的生产时,他的专业化水平达到最大($l_j = l$),并且显现出报酬递增的特征($a_j > 1$),此时生产者就具备了专业化经济。

享该成员专业化活动的经济性，形成“强扶弱”的组织机制①。当然，组织中拥有专业化特性的成员越多，整个组织所体现出来的分工经济也就越明显。(3)分工经济与专业化经济并不是同一概念。专业化经济可以通过分工经济来表现，但它不是后者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专业化经济也可以有分工经济。专业化经济对分工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前者能够有力地推动后者。(4)对专业化经济的选择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一个矛盾。专业化经济以经济组织中成员的相互依赖为基础。分工水平越高，专业化活动的范围越广，所产生的协调困难或协调风险也就越大。这一点类似于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的分析。

经济组织运转的核心是其协调机制和激励机制。在经济组织中，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存在导致了农户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从而形成农户之间经济活动的相互需求。虽然经济组织的协调机制和激励机制是在降低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取代市场机制，但是这并不否定价格机制在组织内部的应用。“许多大型组织事实上在内部却广泛应用价格体系以帮助提供协调和激励。……价格体系在提供协调和激励方面的许多优点，在组织内部与在市场是一样的。”[16]79 组织内部分工与专业化活动的存在正是应用价格机制的基础。经济组织内部应用的是相对价格，相对价格是由组织内部的集中决策决定的虚拟价格，它与市场中通过分散决策所形成的价格不同。这种价格又被称为内部转移价格，是经济组织为确保各类经济活动进行交换的交易支付和索要的价格[16]26-30,80-82。

实际上存在更为复杂的组织内部协调机制。在相对价格的制定权被掌握在经济组织的最高决策者手中的条件下，他可以任意操控相对价格的大小来变动组织内的分工协作关系；并且，这个最高决策者是不可能了解到所有分散在组织成员之间的个体信息，从而使他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帕累托最优的相对价格。在农民经济组织中，如果农户处于非主导地位，就更加容易产生经济活动的扭曲，影响到农户的经济活动水平及其效用(或收入)[9]8。另一方面，农户只是组织的服从者和相对价格的接受者，他们并不能根据相对价格来确定自己的最优决策。在允许农户自由进出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若组织最高决策者制定了不合适的相对价格，也会造成农户不愿选择加入经济组织。

四、农民经济组织内生模型②[17]30-49,103-116

(一)有关模型的假设与说明

1. 对经济系统的设置

假定有一个两农户组成的封闭经济系统。通过这两名农户的决策的交互作用，该经济系统可以演进为非组织性的生产方式(兼业化生产)和有组织的生产方式。假定存在 m 种具有不同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可供农户选择，则经济系统演化的可能结果有 $m+1$ 种。经济组织是否存在以及哪一种经济组织得以形成最终取决于农户的决策和农户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也就是农民经济组织内生的涵义。

2. 对交易费用的假定

我们用交易效率系数 $t_i(0\leqslant t_i\leqslant 1)$ 衡量第 i 种经济组织的交易费用，二者成反比关系；农户在经济组织中为得到数量为 Q 的农产品(或服务)将损失 $(1-t_i)Q$。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中交易

① 专业化经济清晰地说明了能人经济的内在逻辑性，能人经济实质上就是由分工表现出来的专业化经济。

② 这个模型以及下文的分析是对杨小凯分工模型的拓展，拓展方式为：1. 重新设定了个人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从而使模型更具有一般性；2. 对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挖掘，得到了对我国农民经济组织更具有解释力的结论，而其中的一些在已有的农民经济组织的研究中被忽略了。

效率系数为零。对于 $Q=q+t_iq^{d}$①,如果农户选择自给自足,则 $Q=q$;如果在分工中农户不选择生产此农产品,则 $Q=t_iq^{d}$②。

3. 对单个农户的假定

每个农户仅生产和消费农产品(或服务)X 和 Y,每类农产品(或服务)都要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类资本和劳动力具有同质性,可以相互替代。采用 $C-D$ 生产函数表示农户的生产特征:

$$x+x^{s}=Ak_x^{a}l_x^{b},y+y^{s}=Ak_y^{a}l_y^{b}$$

其中 x 和 y 分别是 X 和 Y 的自给自足量和对外界的提供量。A 是技术参数,每个农户的资源禀赋约束为:$l_x+l_y=l,k_x+k_y=k$。假定农户消费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农产品(或服务),并采用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 CES 效用函数:

$$\underset{x,x^{d},y,y^{d}}{\text{Max}}\ U=[(x+t_ix^{d})^{\rho}+(y+t_iy^{d})^{\rho}]^{\frac{1}{\rho}},0<\rho<1$$

农户的专业化经济程度不会无限大,它要受到农户偏好多样性的限制[17]。

4. 对组织内部协调机制的假定

模型中的各种经济组织均采用瓦尔拉斯拍卖机制,并采用恒等式:

$$p_xx^{d}+p_yy^{d}=p_xx^{s}+p_yy^{s}$$

表示该机制。

(二)建立农户规划模型

$$\begin{aligned}\underset{x,x^{d},y,y^{d}}{\text{Max}}\ U&=[(x+t_ix^{d})^{\rho}+(y+t_iy^{d})^{\rho}]^{\frac{1}{\rho}}\\ \text{s.t.}\quad &x+x^{s}=Ak_x^{a}l_x^{b},y=Ak_y^{a}l_y^{b}\\ &k_x+k_y=k,l_x+l_y=l\\ &x^{d}+py^{d}=x^{s}+py^{s},p=p_y/p_x\text{(相对价格)}\\ &x,x^{d},x^{s},y,y^{s},y^{d},l_x,l_y,k_x,k_y\geqslant 0\end{aligned}$$

农户的超边际决策共 2^6 种。农户的最优决策只有两种:(1)同时提供 X 和 Y(兼业化);(2)只提供一种农产品(或服务)并从外界获取另一种农产品(或服务)。这两种决策可使假定的经济系统演进为两类不同的经济状态:S^1(农户无组织的自给自足式兼业化生产)和 S^2(农户有组织的生产)。

在 S^1 中,农户仅有一种生产计划——兼业化,则农户规划模型变为:

$$\begin{aligned}\underset{x,y}{\text{Max}}\ U&=(x^{\rho}+y^{\rho})^{\frac{1}{\rho}}\\ \text{s.t.}\quad &x=Ak_x^{a}l_x^{b},y=Ak_y^{a}l_y^{b}\\ &k_x+k_y=k,l_x+l_y=l\\ &x,y,l_x,l_y,k_x,k_y>0\end{aligned}$$

求得结果如下:

$$l_x=l_y=l/2,k_x=k_y=k/2,x=y=2^{-(a+b)}Ak^{a}l^{b}$$

每个农户所获得的最大效用用间接效用函数表示为:

$$V_{s^1}=2^{-h}Ak^{a}l^{b}\qquad\left(h=a+b-\frac{1}{\rho}\right)$$

---

① q 表示农户对 Q 的自给自足量,q^{d} 表示农户对 Q 的需求量。

② 农户不可能在自己生产 Q 的同时又从别的农户那里获得 Q,因为这会增加交易费用。

在 S^2 中农户有两种互相制约的生产计划可供选择：(1)提供 X 而不提供 Y；(2)提供 Y 而不提供 X。这两种生产计划以农户间的完全分工和专业化活动为基础。

对于选择生产计划(1)的农户，规划模型变为：

$$\begin{aligned} \underset{x,y^d}{\text{Max}}\ U &= [x^\rho + (t_i y^d)^\rho]^{\frac{1}{\rho}} \\ \text{s.t.}\quad & x + x^s = Ak_x^a l_x^b \\ & l_x = l, k_x = k \\ & x^s = Py^d, P = P_y/P_x \\ & x, x^s, y^d, l_x, k_x > 0 \end{aligned}$$

求得结果如下：

$$x^s = \frac{p^r}{p^r + t_i^r} Ak^a l^b, y^d = \frac{p^{r-1}}{p^r + t_i^r} Ak^a l^b, x = \frac{t_i^r}{p^r + t_i^r} Ak^a l^b \quad \left(r = \frac{\rho}{\rho - 1}\right)$$

选择生产计划(1)的农户的最大间接效用函数表示为：

$$V_{(1)} = t_i (t_i^r + p^r)^{-1/r} Ak^a l^b$$

对于选择生产计划(2)的农户，规划模型变为：

$$\begin{aligned} \underset{x^d,y}{\text{Max}}\ U &= [(t_i x^d)^\rho + y^\rho]^{\frac{1}{\rho}} \\ \text{s.t.}\quad & y + y^s = Ak_y^a l_y^b \\ & l_y = l, k_y = k \\ & py^s = x^d \\ & y, y^s, x^d, l_y, k_y > 0 \end{aligned}$$

求得结果如下：

$$x^d = \frac{p^{1-r}}{p^{-r} + t_i^r} Ak^a l^b, y^s = \frac{p^{-r}}{p^{-r} + t_i^r} Ak^a l^b, y = \frac{t_i^r}{p^{-r} + t_i^r} Ak^a l^b$$

选择生产计划(2)的农户的最大间接效用表示为：

$$V_{(2)} = t_i (t_i^r + p^{-r})^{-1/r} Ak^a l^b$$

(三)结果分析

1. 在瓦尔拉斯拍卖机制下，相对价格不会被操纵，选择生产计划(1)的农户与选择生产计划(2)的农户所获得的效用将相等，即 $V_{(1)} = V_{(2)}$[①]。这样在 S^2 中的每位农户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_{s2} = t_i (1 + t_i^r)^{-1/r} Ak^a l^b$$

当 $V_{s2} > V_{s1}$，即 $t_i > (2^{r/h} - 1)^{-1/r}$ 时，农户在 S^2 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要好于在 S^1 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于是农户会选择在经济组织中进行生产活动，否则农户选择在自给自足条件下进行兼业化生产。决定农户是否选择加入某种经济组织依赖于农户自身的个人专业化生产特征、个体偏好特征以及衡量各类经济组织特性的交易费用。m 种经济组织中哪种类型得以形成也成遵循同样的原则。结果还显示：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新技术的传播应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并不是农户选择加入农民经济组织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农户在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只不过农户处在了更高水平上的自给自足。

2. 如果相对价格可以被操纵，则农民经济组织的形成由以下两种机制决定：

---

① 得到 P = 1。

(1)当 $V_{(2)} > V_{(1)} > V_{S^1}$[①]时。农民经济组织基本上能够形成。此时交易效率的临界值还要受相对价格的影响,组织形成的机制复杂化了[②]。在具有这种绩效特征的农民经济组织里,各个农户的效用并不相等,组织整体的运行存在效率缺失。但是,在一定的效用差异度之内,组织还是能够对每一个农户注入维系其运转的动力。当然,超过了某些农户可承受的效用差异,这种组织却也是极易瓦解的。

(2)当 $V_{(2)} > V_{S^1} > V_{(1)}$ 时。这种情况下讨论农民经济组织的形成必须从其整体上把握。若 $V_{(2)} - V_{S^1} > V_{S^1} - V_{(1)}$[③],则组织中农户整体的效用要好于自给自足的情形,地方政府往往依此作出相应的组织推广策略;但是,总体农户效用的增加掩盖了单个农户效用的缩水,这可能是他(她)无法承受的效用缺失。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农民经济组织能够被作为"模式"和"样板"推行,而又不能长久维系的矛盾现象。

五、结束语

由于地方政府大力普及推广农业技术,单个农户的人力资本表现出增进的个体规模效应,这使得极端分工下的总合经济效率凸现。在这个条件下,地方政府有可能成功推行"模式"型的农民经济组织,"边干边学"和知识经济的效应就是此类经济组织的诞生逻辑。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经济组织的形成过程里存在其独有的分工优势,但是,实际表现出来的情形却是地方政府在农民经济组织中的分工错位[④]。那么,地方政府和农户以及农民经济组织应怎样融合呢?

在对专业化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农户专业化经济的实现机制:

$$\{x_i = A_i l_i^{a_i} : A_i > 0; a_i > 0; l_i \geqslant 0; \sum_1^n l_i = l; i = 1,2,\cdots,n\} \rightarrow$$

$$\{x_i = A_i l_i^{a_i} : A_i > 0; a_i > 0; l_i \geqslant 0; \sum_1^m l_i = l; i = 1,2,\cdots,m; m < n\} \rightarrow$$

$$\{x_j = A_j l_j^{a_j} : A_j > 0; a_j > 1; l_j = l; j < m\}$$

这一过程意味着农户所承担的经济职能不断地被剥离出去,不断地外化;同时,这也是农户资产专用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农户不断加深对他人专业方向选择的依赖的过程[17]。与之相伴相随的是农户需求结构的多样性与深层次的演进过程,此相互矛盾的两方面构成了农村经济网络式的发展路径。相应地,地方政府在农村经济中的行为模式就获得了一个客观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要求地方政府能与农户及农民经济组织有相匹配的专用性投资和关系性投资,能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因此,地方政府的功能要均衡地嵌入农民经济组织当中,在农户的分工体系里合理地展现出自身的分工特征。

参考文献:

[1] 牛若峰.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观察和评论[J]. 农业经济问题,2006,(3).

[2] 史金善. 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缓慢的原因与对策[J]. 南方农村,2005,(5).

① 由于农户的对等地位,可选取 $P>1$ 展开分析。在 $P>1$ 时有 $V_{(2)} > V_{(1)} > V_s$。

② 组织形成机制由 $t_i = P(2^{hr} - 1)^{-1/r}$ 确定。

③ 组织形成机制由 $[1 + (t_i/P)^{-r}]^{-1/r} + [1 + (t_i P)^{-r}]^{-1/r} = 2^{1-h}$ 确定。

④ 德国合作社学者缪恩克勒(Hans - H. Münkner)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合作社常常被政府视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行动常常被政府所控制,从而其作用就如同政府机构的延伸。

[3] 毕泗生，等. 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4] 宣杏云，徐更生. 国外农业社会化服务[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08，211.
[5] 宣杏云，王春法，等. 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透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127，136.
[6] 费孝通. 中国绅士[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 蔡　昉. 合作与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与农民社区组织[J]. 中国农村观察，1999，(5).
[8]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EB/OL]. (2006 - 11 - 01). http://www.agri.gov.cn/zcfg/nyfl/t20061101_712436.htm.
[9] 张晓山. 创新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现代农业[J]. 农业经济问题，2006，(8).
[10] 邹　薇.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框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78 - 179，369 - 370.
[11]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4，63.
[12] 舒尔茨. 报酬递增的源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46.
[13] 明恩溥. 中国乡村生活[M]. 北京：中华书局，2006：31 - 34.
[14]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3.
[15] 杨小凯. 数理经济学基础[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272 - 273.
[16] 保罗·米尔格罗姆. 经济学、组织与管理[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7]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06 - 207.

Individual Peasant Decisions and Endogenousness of Peasant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ra-marginal Analyses

WU Zhong-ming
(*Party School of CPC Guangdong Province Committee*, *Guangzhou* 510053,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 peasant in the division of collaboration will obtain the economy of "1 + 1 > 2", and it is through specific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arrange single peasant collaboration that he will to achieve such economic division. However, there will be the transaction costs between individual peasant in the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When the transaction costs are more than the economy, individual peasant would not choose to join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ut local governments are often not fully informed how individual peasant consider the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relative price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s, which 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peasantry not to choose to join the "model" type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ly on its own division characteristics to insert reasonably its role into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peasant economic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individual peasant decisions; economic organizations; division of labor; transaction costs; specialization